

“全球南方”崛起与世界格局演变

□ 徐秀军 沈 陈

〔提 要〕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乌克兰危机持续胶着和大国地缘竞争显著加剧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在经济、政治和国际地位等方面全方位崛起进程加速，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并已成为决定世界格局走向的关键变量之一。在世界格局深度调整和变革的进程中，“全球南方”扮演了多极世界格局的平衡手、多维世界格局的博弈者和多元世界格局的指示器等重要角色。但也应该看到，“全球南方”发挥与其实力相称的影响力仍面临诸多挑战：外部干扰过大与抗干扰能力不足、力量整合需求上升与机制化平台缺乏、维护共同利益与满足诉求多样化的矛盾。作为“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中国坚定维护“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积极参与和引领南南合作，未来将继续为“全球南方”的发展与合作注入强大动力，推动“全球南方”成为未来世界格局更加重要的力量。

〔关 键 词〕全球南方、世界格局、南南合作

〔作者简介〕徐秀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沈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 (2023) 4 期 0064-15

作为一种国际力量，“全球南方”并非一个内涵明确的概念。一般认为，“全球南方”融合了新时代世界格局演进的两大特征：“全球”凸显了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不断增强的相互联系，以及由此得到不断提升的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性；“南方”凸显了世界经济中心加速向南方转移，尤其是亚洲、非洲和拉美等发展中地区不断扩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近年来，随着大国博弈日益加剧，“全球南方”的战略自主不断增强，战略价值不断上升，并成为影响世界格局走向的重要变量之一。

一、百年变局下“全球南方”的全方位崛起

从历史来看，“全球南方”的兴起与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冷战时期，“全球南方”通过发起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和 77 国集团等合作机制，逐步形成了相互之间的身份认同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价值取向，并以此表示对美苏两极格局的不满。冷战结束后，随着苏东剧变和两极格局的终结，“全球南方”受到国际社会日益广泛的关注。尤其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大幅改变了人们对“全球南方”的认识，“全球南方”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大幅提升。乌克兰危机后，“全球南方”不仅没有全面倒向西方，还公开表达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乌克兰危机也被视为“全球南方”政治觉醒的重要标志。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乌克兰危机持续胶着和大国地缘竞争显著加剧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全方位崛起进程加速，成为百年变局深度演变的推动力量。

（一）“全球南方”的经济崛起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出现快速增长，拉开了“全球南方”经济崛起的序幕。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数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90 年发达经济体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63.1%，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只占 36.9%；2008 年新

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 GDP 占全球的份额达 51.3%，实现了对发达国家 GDP 总量的超越；2022 年这一份额进一步提升至 58.3%，比发达经济体的份额高 16.5 个百分点。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全球经济还将延续双速增长格局，“全球南方”的经济崛起进程还将继续，预计 2028 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 GDP 总量将达到发达经济体的 1.6 倍。^[1] 作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代表，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高于七国集团成员的总和。其中，中国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随着全球经济重心加速从发达经济体向“全球南方”转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的地位也发生了相应变化。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又以发达国家相互间的贸易为主。1948 年，发达国家占国际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的比例为 62.9%，1993 年这一比例更是达到 72%。此后，“全球南方”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2010 年，“全球南方”占国际货物贸易出口的比例上升到 37%。尽管新冠疫情大流行对国际贸易带来巨大冲击，2020 年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货物和服务出口较上年分别下降约 9% 和 15%，但“全球南方”贸易快速增长态势迅速恢复。2022 年，“全球南方”国家贸易总额创历史新高，超过 13.3 万亿美元，出口贸易占全球份额上升至 42% 左右。^[2] 未来 5 年，东南亚、南亚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有望成为“全球南方”乃至全球贸易额增长最快的地区。

“全球南方”的经济崛起不仅改善了全球经济与贸易发展不平衡问题，还使全球贫困问题得到较大缓解。在“全球南方”经济快速增长的 30 余年里，全球贫困人口从 1990 年占总人口 38% 下降到 2019 年的 8.4%；预计到 2030 年，世界上 80% 的中产阶级人口将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约 7000 万人陷入极端贫困，这是自 1990 年开始全球贫困监测以来增幅最大的一年。2020 年底，估计有 7.19 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 2.15 美元，

[1]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 Rocky Recovery,” April 11, 2023.

[2] UNCTA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Progress Towards the SDGs Through Trade,” January 1, 2023, <https://sdgpulse.unctad.org/trade-developing-economies/>.

全球 60% 的极端贫困人口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1] 尽管实现 2030 年消除贫困的目标可能因疫情等原因出现迟滞,但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已逐渐恢复,其减贫进程也将随之重回正轨。

(二) “全球南方”的政治觉醒

近年来,“全球南方”的政治觉醒成为世界格局演变的重要表现之一。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在获取发展中国家政治认同和政治支持的同时,对发展中国家在债务、粮食、移民、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需求反应迟缓甚至置之不理,或者采取双重标准制造矛盾和分歧。例如,在始于 2020 年的埃塞俄比亚提格雷战争中,多达 50 万人死于战争和饥荒,西方不仅对此视而不见,还以各种理由干涉其内政。2022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向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和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都达到空前水平,数百万乌克兰难民在舆论上受到欧洲国家的热烈欢迎,这也与 2015 年非基督徒难民导致欧洲民粹主义泛滥形成鲜明对比。乌克兰危机让国际社会重新认识到,西方国家追求绝对安全带来的必然是绝对的不安全以及自身合法性的日益丧失。尽管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把乌克兰危机变成一场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意识形态之争,但“全球南方”国家认为西方国家的呼吁充满自私和伪善,主张重点关注因新冠疫情大流行、乌克兰危机导致的经济发展难题。从一定意义上讲,乌克兰危机成为“全球南方”对西方国家鼓吹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普遍觉醒的开端。

“全球南方”的政治觉醒还体现为对自身发展模式的自信与自觉。为推广西方发展模式和所谓“普世价值”,西方国家故意无视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并将普世主义和西方主义混作一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西方试图以西式甚至美式现代化理论重塑“全球南方”的发展模式和道路。然而,经过数十年的实践,所谓的现代化理论、“华盛顿共识”等西方发展理论并没有改变“全球南方”的发展困境。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

[1] World Bank, “Global Progress in Reducing Extreme Poverty Grinds to a Halt,” October 5, 2022,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22/10/05/global-progress-in-reducing-extreme-poverty-grinds-to-a-halt>.

经验表明,“全球南方”国家应结合自身国情,独立自主探索一条适合本国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很多“全球南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高度认同中国式现代化的借鉴意义,通过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等多种途径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打破了西方国家对现代化理论和道路的禁锢,意味着“全球南方”有能力摆脱西方资本和外部政治势力的干涉,追求自主的发展道路,制定自主的发展计划,打造自主的政治模式。

(三) “全球南方”的国际地位提升

长期以来,“全球南方”被视为国际事务中的次要角色,或只是地缘政治危机和大国博弈加剧时的“棋子”。随着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并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日趋重要的作用,西方国家越来越侧重于从整体视角看待“全球南方”问题,并寻求与之开展合作。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主编拉维·阿格拉瓦尔(Ravi Agrawal)撰文称,从气候谈判到体育再到外交,“全球南方”国家都越来越引人注目,也越来越有影响力。^[1]2023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设置“南北合作”专场讨论,会上公布的《2023年慕尼黑安全报告》重点关注了“全球南方”议题,50余次提及“全球南方”一词。^[2]5月举行的七国集团广岛峰会将加强同“全球南方”合作作为会议重要议题之一,并邀请巴西、印度、印尼(东盟轮值主席国)、越南、科摩罗联盟(非盟轮值主席国)、库克群岛等“全球南方”国家作为对话伙伴与会,提出在贸易、供应链弹性、外交和安全政策等领域加强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联系。

乌克兰危机以来的事实证明,美国试图通过施压或胁迫使“全球南方”站在西方一边的效果微乎其微。自联合国大会对乌克兰危机的第一次投票以来,发达国家与“全球南方”围绕是否将特定国家排除在联合国及其下属机

[1] Ravi Agrawal, “Why the World Feels Different in 2023,” *Foreign Policy*, January 12, 2023.

[2] Tobias Bunde et al.,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3: Revision*, February 2023,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publikationen/munich-security-report-2023/>.

构之外等问题产生了明显分歧和争论。2022年3月，当联大召开特别紧急会议就一项谴责俄罗斯的决议进行投票时，有37个“全球南方”国家表示反对或弃权。同年4月，当联大就一项暂停俄罗斯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的决议进行投票时，反对或弃权的国家增加到82个，其中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印尼、南非等主要“全球南方”国家。此外，“全球南方”国家很少参与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之外的惩罚行动，即便是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也明确拒绝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或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这与美西方国家单方面发起针对俄罗斯的经济战形成鲜明对比，也意味着越来越多“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上不再附和西方国家的霸权霸道霸凌行径，而是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和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表达自身立场。非西方世界将不再接受“被排除在全球决策之外”^[1]。

二、世界格局演变中的“全球南方”新角色

冷战时期，参与“不结盟运动”的国家曾试图在美苏两极之间保持中立，但在美苏霸权的施压下，很多国家不得不在两个阵营之间做出选择。随着“全球南方”在经济、政治和国际地位等方面的崛起，越来越多“全球南方”国家相信，卷入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意识形态之争没有任何好处，因此拒绝在大国对抗中选边站队。“全球南方”的复兴反映了当代地缘政治的发展态势，美国也将其视为挑战，并难以找到全面的应对之策。^[2] 在世界格局深度调整和变革进程中，“全球南方”作为一种国际力量，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

[1] Andrew Sheng and Xiao Geng, “The Irresistible Rise of the Rest,” Project Syndicate, July 26, 2023,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hina-india-surpass-us-gdp-great-power-competition-by-andrew-sheng-and-xiao-geng-2023-07>.

[2] James Jay Carafano, “America’s Response to the Global South,” GIS Reposts, August 3, 2023, <https://www.gisreportsonline.com/r/global-south-united-states/>.

（一）多极世界格局的平衡手

从综合国力的对比变化来看，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日趋明显。一些发达国家为维护自身优势地位，毫不掩饰发动一场“新冷战”的想法，并试图拉拢“全球南方”以便在地缘竞争中取得优势甚至“胜利”。历史表明，冷战时期的两极对抗会给“全球南方”带来巨大的安全风险，而冷战结束后的单极霸权同样会损害“全球南方”的权利和利益。因此，“全球南方”更倾向于构建一个能给自身带来不同战略选项的多极世界。“全球南方”反对加入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等国的制裁与打压，而寻求在大国之间构建灵活、平等的伙伴关系。例如，在经贸、卫生、气候等发展议程上，印度反对从美欧发达国家角度制定规则，主张团结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共同推动公正民主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与此同时，印度又积极迎合美、日等国推出的“印太战略”，强化自身与西方国家在政治安全领域的捆绑。

在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上，“全球南方”在平衡大国博弈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在乌克兰危机上，即便在加入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后与“全球北方”关系愈发密切，印度仍不愿对俄罗斯采取外交和经济制裁。巴西、南非、印尼、巴基斯坦、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全球南方”国家也采取了平衡稳健立场，认为乌克兰危机属于欧洲的问题，而非世界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南方”采取的平衡稳健立场与外交中立并不完全一致。外交中立意味着不采取立场，在政治上与大国保持等距；平衡稳健立场则代表了积极、有活力和建设性的对外政策。中国、巴西、南非、沙特等“全球南方”国家或提出与西方立场迥异的和平方案，或往返于俄罗斯、乌克兰之间劝和促谈。2023年2月，在全世界纪念乌克兰危机一周年之际，南非坚持在本国夸祖鲁—纳塔尔省海岸与俄罗斯、中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全球舞台上展现了不屈服于西方霸权的立场。

除了乌克兰危机外，“全球南方”在其他国际事务上的自主性也在上升。在安全领域，2023年3月中国斡旋伊朗和沙特恢复外交关系以后，中东地区国家的对话协商进程出现连锁反应，卡塔尔同巴林、土耳其同埃及、伊朗同

阿联酋、叙利亚同阿联酋等双边关系得以恢复或改善，也门局势也出现了一定转机，自西方国家鼓动“阿拉伯之春”以来的地区乱局逐步得到扭转。在经济领域，尽管面临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和警告，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仍根据本国发展利益考虑选择合作伙伴，深化经贸往来和产业链合作。在外交领域，印度借机举行“全球南方之声峰会”，积极响应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诉求，以便在自己作为主席国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表达“全球南方”的声音，进而展示自身在“全球南方”的引领作用。^[1]

（二）多维世界格局的博弈者

从不同领域的功能作用来看，世界格局是复杂多维的，拥有某一领域优势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也会成为重要的国际力量。在各国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衡量国家力量和影响的维度更加全面立体。这为综合国力相对较弱但某一领域优势突出的小国成为国际博弈的重要参与者提供了可能。

由于资源禀赋有限，“全球南方”国家往往选择本国的优势领域，重点塑造小范围、专业性的利基（niche）。^[2]在原料生产方面，印尼拥有全球22%的镍储量，智利拥有世界26%锂储量，刚果民主共和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钴矿床。锂、镍、钴是生产电动汽车、新能源电池等产品所必需的矿产，印尼、智利、刚果民主共和国因此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在生产加工方面，越南、菲律宾、孟加拉国等东南亚、南亚国家在全球贸易中具备明显的劳动力优势，能够以较低成本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从而吸引众多跨国企业在其境内设立生产基地。当然，也有部分实力较强的中等强国兼具多种利基，如沙特阿拉伯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领导国，同时在世界宗教事务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巴西是全球矿产资源的主要生产地，同时又以亚马逊雨林保护为抓手引领气候减排和生态保护合作。

[1] 沈陈：《新兴大国对“全球南方”的政策立场与行动》，《世界知识》2023年第12期，第19-22页。

[2] “利基”一词来自商业术语，即通过更窄地确定某个群体，从中构建一个细分市场并作为获取利益的基础，进而用专业化经营来获取最大限度的收益。

在多维世界格局中，利基是“全球南方”在其中拥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关键。与西方大国不同，“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非常有限，与自身实力很不匹配，而只在其具备优势、资源集中的利基上发挥影响力。这种依托各自优势资源的外交模式被称作“利基外交”（niche diplomacy）。保加利亚自由战略中心主任伊万·克勒斯特夫（Ivan Krastev）认为，大国对立在给那些处于中间地带的中等强国带来威胁的同时也提供了机会，“美国和中国必须管理一个被中等强国行动主义重塑的世界”。^[1]当前的地缘政治竞争使“全球南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能动性，它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利用利基优势在全球追求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例如，尽管石油减产可能会加剧发达国家严峻的通胀问题，并被美国视为在乌克兰危机中“站在俄罗斯一边”，但沙特主导的OPEC仍顶住压力，在2022—2023年多次与俄罗斯做出联合减产的决定。再如，2023年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推出所谓“关键矿产俱乐部”，将印尼、土耳其、秘鲁等资源丰富的“全球南方”国家作为重点争取的对象，客观上提升了这些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三）多元世界格局的指示器

从价值理念的发展演进来看，世界格局是多元文明与文化的共存，并且全球价值体系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全球南方”的崛起则是这一趋势的重要指示和代表。从冷战时期开始，“全球南方”国家就有意识地塑造不同于美国和苏联的价值体系，主张平等性和包容性，反对一元化和普世性。万隆会议是历史上首次由亚非国家自主组织和召开的会议，反映了亚非国家掌握自己命运、与世界其他国家平等合作的愿望。中国、印尼、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在万隆会议发挥了引领议程和凝聚共识的作用，不仅提出“求同存异”这一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交往方式，还成功将中印等国共同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纳入“万隆十项原则”，开启了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南南合作框架。在

[1] Ivan Krastev, “Middle Powers Are Reshaping Geopolitics,”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18, 2022.

此框架下，“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仅取决于发起国的意愿和努力，更取决于东道国如何利用这种合作来满足其国内需求，从而为“全球南方”国家在资源、产业和技术等方面的平等包容合作打下基础。

与20世纪的南南合作相比，“全球南方”国家明显减少了带有反西方色彩的激进意识形态话语或规范，而是从自身利益和需要出发提出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国际议程，并且逐渐拥有将这些议程变为现实的意愿和能力。在南南合作方面，阿根廷、印尼、伊朗、埃及、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等20多个国家表示有兴趣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沙特、阿尔及利亚等国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新开发银行。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加入，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日益上升。在南北对话方面，“全球南方”积极追求全球治理过程的多元性，推动“真正的多边主义”。例如，一些拉美国家提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不仅适用于穷国、弱国或债务国，也应适用于富国、强国和债权国，以此让IMF中的发达国家信守承诺。^[1]总之，“全球南方”的崛起意味着多元力量的崛起，更是多元文明和价值观共存的标志。

三、“全球南方”推动世界格局演变的制约因素

随着“全球南方”的全方位崛起和自主性提升，世界格局的主要矛盾绝非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发达国家与“全球南方”之间的利益与立场分歧。同时，“全球南方”仍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在西方话语的塑造下，可能成为分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武器。因此，“全球南方”要在未来世界格局演变发挥更加重要作用仍面临很多现实挑战。总体来看，“全球南方”主要面临外部干扰过大与抗干扰能力不足、力量整合需求上升与机

[1] J. Luis Rodriguez and Christy Thornton,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Global South: A View from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5, No.5, 2022, pp.626-638.

制化平台缺乏、维护共同利益与满足诉求多样化三个方面的矛盾。这也是“全球南方”推动世界格局演变的主要制约因素。

（一）外部干扰过大与抗干扰能力不足的矛盾

在国际舞台上，发展始终是“全球南方”的核心诉求。然而，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全球南方”总体上同主要发达国家形成了不对称依赖关系，凸显了“全球南方”发展的脆弱性。近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加息举措也给“全球南方”带来很大冲击。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表的《2022 贸易与发展报告》估计，约 90 个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对美元贬值，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贬值超过 10%。^[1] 加上近期全球食物和能源等必需品价格飙升，导致发展中国家进口价格进一步上涨。虽然现有 46 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基础有所巩固、出口额有所增长，但其中多达 38 个国家仍然依赖商品出口，60% 以上的商品出口依赖初级商品，对大宗商品出口的高度依赖使这些国家极易受到贸易冲击。自 2011 年以来，最不发达国家在世界货物和服务出口中的份额一直徘徊在 1% 左右，到 2020 年在全球出口中所占份额比 2011 年翻一番（2%）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未能实现。^[2] 虽然在供应链的关键环节，部分“全球南方”国家具有竞争优势，使其可以利用自身资源禀赋获得一定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但是，这种地位提升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是外生的，缺乏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足够能力。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最贫穷的群体承受了疫情最沉重的代价，最贫穷的 40% 人口平均损失 4% 的收入，是收入分配中最富有的 20% 人口平均损失的两倍，全球不平等现象几十年来首次加剧。^[3] 乌克兰危机对粮食等大宗商品的供应构成挑战，“全球南方”亦是主要受害方。联合国发布的《2023 年世

[1] UNCTAD,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22*, Geneva: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2023, p.46.

[2] UNCTAD,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and LDCs Reached a Record Level in 2022,” October 11, 2022, <https://sdgpulse.unctad.org/trade-developing-economies/>.

[3] World Bank,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20: Reversals of Fortune,” October 7, 2020, <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poverty-and-shared-prosperity-2020>.

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指出,2022年全世界有6.91亿至7.83亿人面临饥饿,西亚、加勒比和非洲各次区域的饥饿水平仍在攀升。非洲大陆首当其冲,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食不果腹,饥饿人口比例是全球平均的两倍多。^[1]2022年11月,国际粮农组织发布的一份题为《应对乌克兰危机:利用社会保护促进粮食安全和营养》的研究报告指出,如果乌克兰危机持续下去,2022—2023年全球营养不足人数可能会增加800万至1300万,其中亚太地区的增长最为明显,其次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近东和北非。^[2]总体来看,“全球南方”对外依赖的不对称性仍很突出,抗击外部影响与冲击的能力仍很有限,塑造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内生动力的任务仍很艰巨。

(二) 力量整合需求上升与机制化平台缺乏的矛盾

从内部看,“全球南方”不是一个国际组织或政治集团,也没有明确的成员构成,不足以将松散力量凝聚成统一的机制化平台。^[3]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等冷战时期的南南合作多是非正式的对话平台,并未形成目标明确、规则健全、行动高效的机制或机构。由于“全球南方”国家众多,彼此之间的价值观念不同、发展水平各异,各方除了就发展等原则问题达成指导性决议外,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组织内部缺乏稳固的立场协调机制。为整合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力量,金砖机制应运而生。金砖机制的成立以及“金砖+”合作的持续推进,为提升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国际话语权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了重要平台。包含主要“全球南方”国家的G20机制等多边平台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加强“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提供了渠道。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全球南方”仍缺乏有效的机制依托,在世界格局演进中的影响力因此难以得到

[1] FAO, “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 2023,” August 3, 2023, <https://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c3017en>.

[2] FAO, “Response to the Ukraine Crisis: Social Protection for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April 7, 2022, <https://www.fao.org/3/cc3321en/cc3321en.pdf>.

[3] 徐秀军:《“全球南方”热潮的缘起与影响》,《世界知识》2023年第12期,第14-16页。

有效发挥。

从外部看，冷战后的全球治理机制主要按照发达国家的价值和利益取向设计的，对“全球南方”的多样化背景和需求考虑不足，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优势分散于不同的功能领域，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由于全球治理机制固有的非中性，治理规则制定权常常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的实力提升难以转化为与其实力相匹配的制度性话语权。此外，发展中国家的治理能力和经验相对薄弱，在全球决策机制中的参与度较低，限制了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即便是国际地位明显上升的新兴经济体也常常只能对现有的多边机制进行选择，使其能够灵活介入关键的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制度，但在对国家利益并非至关重要的领域仍然是旁观者。^[1]在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互叠加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业已存在的背景差异、利益竞争与机制缺失被放大，“全球南方”的力量整合面临更多障碍因素。

（三）维护共同利益与满足诉求多样化的矛盾

“全球南方”是一个有着共同利益但彼此诉求多样化的群体，彼此的利益在很多领域存在差异和分歧，甚至存在竞争和冲突。例如，在推动全球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构建清洁美丽的世界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符合“全球南方”国家利益，但在具体目标与标准设定、风险与责任分担等问题上，“全球南方”因立场分歧较大而无法达成共识，更难以形成一致行动。对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传统能源并且新能源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激进的能源转型将给其发展进程带来负面影响。无论是传统能源的出口大国还是消费大国，在没有合适替代选择的情况下，放弃传统能源无疑将直接损害其发展权。但是，对生态环境脆弱、海拔较低的国家而言，加快世界能源转型和大幅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却是当务之急。如果全球气温继续上升，海平面

[1] Charalampos Efsthopoulos, “Southern Middle Powers and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Options for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76, No.3, pp.384-403.

将进一步抬升，一些地区的民众将失去栖身之地，部分小岛屿国家甚至可能被完全淹没。

自万隆会议以来，“全球南方”国家就在国际场合积极发出共同声音，维护共同利益，并以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合作，以分享和借鉴经验、技术和资源，争取更多的发展援助和国际支持。但随着“全球南方”国家自主性和外交独立性的提升，其作为一个群体的内部利益诉求也日益多样化。由于群体内部成员多样化和外部势力的拉拢，“全球南方”的共同命运意识和群体归属感仍不强烈，“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仍有待增强。截至目前，“全球南方”尚未出台或商讨统一的立场文件，短期内难以提出类似于“万隆精神”的“全球南方”普遍价值，从而为维护共同利益奠定共同的理念基础。同时，“全球南方”缺乏协调不同利益诉求和实现共同利益的行动纲领，从而使彼此之间的客观差异成为认知与强化共同利益的羁绊。日益凸显的多样化诉求如果长期得不到有效协调和有机融合，“全球南方”塑造未来世界格局的力量将遭受削弱，甚至会有一定条件下形成内耗。

四、结语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全球南方”的全方位崛起大大加速。在经济方面，“全球南方”通过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的推进，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逐渐崭露头角，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全球南方”经济的快速增长扩大不仅改变了世界经贸格局，也有力推动了多极化进程的发展。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全球南方”积极提出应对地缘冲突和全球问题的治理方案，拒绝卷入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之争。尤其是“全球南方”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超越了置身事外的外交中立和盲目跟风的外交追随，体现出一种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政治觉醒，成为其全方位崛起的重要表现。

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中国同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一样，遭受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充分理解与认同探索独立自主发展道路

的重要意义。这种“天然的亲切感”长期沿袭，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认同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2023年7月，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上中方提出，独立自主是“全球南方”的政治底色，发展振兴是“全球南方”的历史使命，公道正义是“全球南方”的共同主张。^[1]中方的立场和主张为凝聚“全球南方”合力增加了积极因素，并推动“全球南方”热潮朝着正确方向演进。

中国提出并推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重大国际合作倡议，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全球南方”发展的内生动力、提供了“全球南方”合作的机制平台、维护了“全球南方”的实际利益，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支持和响应。中国过去是南南合作的参与者和引领者，未来将继续把“全球南方”作为外交战略、知识转移、资源配置和制度建设的优先方向，不断为“全球南方”的发展与合作注入强大动力，从而推动“全球南方”成为未来世界格局更加重要的力量。

【责任编辑：宁团辉】

[1] 《王毅就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提出四点主张》，新华网，2023年7月26日，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07/26/c_1129768124.htm。

Politics of Rights: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ith Modernity

XU Jian

In a world of chang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sinking into the moral dilemma of power politics and the power dilemma of moral politics. People have long confused the major difference between pre-modern and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former is power politics, and the latter is rights politics.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re increasingly manifested as conflicts of rights, which may be transformed into conflicts of power. Power politics may be hidden under the package of rights. The politics of rights reflects the direction of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s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and the Evolution of World Structure

XU Xiujun & SHEN Chen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sluggish global economic growth, the ongoing Ukraine crisis and significantly intensified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powers, the Global South has accelerated its all-round rise in terms of economy,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tatus, showing unprecedented influence, and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variables determin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world structure. In the process of profound adjust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structure, the Global South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s a game player, a balancer and an indicator. The Global South still faces contradictions between excessive external interference and insufficient anti-interference capability, rising demand for capacity integration and lack of institutional platforms, and safeguarding common interests and pursuing diversified preferences. As a natural member of the Global South, China firmly upholds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the Global South,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and leads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strong impetus into th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of the Global South in the future, and promote the Global South to be a more important force in the future world structure.

Impact of the New Generation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YU Nanping

The breakthrough of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 technology, represented by ChatGPT, heralds the opening of the AGI era. Unlike the impact of weak AI technology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era of dataism, AGI is no longer a mere tool of empowerment. The human-machine integration will rapidly and deeply embed itself in socio-political and economic fields. It will reshape the mod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ffec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geopolitics through its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strength. But it also brings new challenges. Recognizing the impact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AGI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no longer a technological imagination nor a vague technical description. The AGI-driven underlying changes in productivity are bound to produce a disruptive reconfigur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rms, Roots and Implications of Biden's Economic Nationalism

LIU Feitao

Sinc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ok office, its economic and trade policies have inherited the economic nationalism while downplaying Trump's populism. Through institutional strengthening and strategic promotion, the economic nationalist policies